

宋仁宗、英宗易代事研究

On the Song Dynasty Imperial Succession by the Yingzong Emperor to the Renzong Reign

霍无忌

Huo Wuji

内容提要：

宋代的第四位皇帝仁宗赵祯与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之易代，看似平稳，但实际的易代过程却极为坎坷。宋仁宗亲生之子早殇，又不愿过继宗室之子为后，故储位长时间空悬。直至嘉祐七年（1062），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仁宗方立宗室之子赵曙为皇子。储位虽定，但风波未平，仁宗对皇子的冷落、赵曙（即英宗）即位后的“暴病”、曹太后垂帘听政等政治事件此起彼伏，未见停歇。直至英宗亲政，政治风波才告平定，易代之事亦正式结束。同时，该易代事对宋代政治发展之影响，亦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

宋仁宗 宋英宗 储位 帝位更迭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from the fourth emperor of the Song Dynasty - the Renzong Emperor Zhao Zhen (r. 1022-1063) to the fifth emperor - the Yingzong Emperor Zhao Shu (r. 1063-1067) was by no means peaceful as it seemed to be. In contrast, what happened was extremely bumpy. With all his three sons dying in either infancy or early childhood, the Renzong emperor declined to adopt a male heir from the imperial lineage as his successor. Consequently the post of heir apparent kept vacant for a long time. It was not until 1062 - the second-to-the-last year of the Renzong reign - and push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at he granted Zhao Shu, a male candidate from the imperial clan, the official successor to the throne. But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The Renzong emperor's neglect of the heir apparent, the sudden illness of the Yingzong Emperor immediately after his enthronement, and the Empress Dowager Cao's intervening with political affairs took place one after another. It was not until the Yingzong emperor personally initiated his rule over the empire that the political turmoil was calmed down and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officially concluded.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on the Song dynasty political stability can not be ignored.

KEYWORDS:

Renzong emperor of the Song dynasty, Yingzong emperor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post of the heir apparent, imperial succession

嘉祐八年（1063）三月辛未日夜间，宋仁宗突然崩逝，此时陪侍于仁宗榻侧之人，除宦官、宫女及为仁宗诊脉的太医外，便只剩下仁宗皇后曹氏，皇宫内一时慌乱异常。但慌张过后，曹皇后立即主持宫中大局，安稳人心，并于第二日清晨，召宰辅商议后，拥立皇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¹。整个易代过程看似平稳，但隐藏于易代事背后的诸多问题却还有待深入研究。

当前宋史学界对北宋的皇位继承、帝位更迭问题研究较多，但多集中于考察与宋初疑案相关的太祖、太宗易代事和北宋中期真宗、仁宗易代问题，对仁宗、英宗易代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²，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一探仁宗、英宗易代事之详情，并深入分析此次易代事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 国之大事——仁宗朝的储位问题

宋仁宗亲生皇子皆早逝，致使仁宗朝储位长期空悬，直至嘉祐七年（1062），基于多重因素考量，宋仁宗才半自愿半无奈的过继宗室子赵宗实为嗣，仁宗朝储位问题遂宣告解决。回顾仁宗朝储位问题由兴起到解决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迁延数十年的仁宗朝储位问题实际上拉开了宋仁宗、英宗易代事的序幕，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一）赵宗实的入宫与离宫及宋仁宗皇子之殇

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由于仁宗后宫未曾诞育皇子，故不得不仿效真宗时成例，选宗室子养于宫中，赵宗实（即宋英宗）便是这些宗室子中的一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曾记载赵宗实幼时被养育于宫中的经历，“宗实，宁江节度使，允让第十三子也。生四岁，养于宫中，时方六岁”³。此段记载时间为景祐四年（1037）六月，可见赵宗实自景祐二年（1035）起便被抚养于宫中。这期间，仁宗美人俞氏虽诞下一子，但出生当日即告夭折⁴，赵宗实得以继续养于宫中。

然而，宝元二年（1039）六月壬申，“左千牛卫将军宗实为右千牛卫将军，始自宫中出还第，时年八岁”⁵，赵宗实的这一次离宫，很可能是因为仁宗已听闻其美人苗氏有孕，便乘机将非亲生的赵宗实送出宫外。当年八月甲戌，美人苗氏诞下皇第二子（后赐名赵昕）⁶。然而，庆历元年（1041）二月己亥，赵昕病逝。此时北宋西北边境狼烟四起，西夏军队在好水川、定川寨等地大败宋军，宋仁宗在如此危急时刻仍然下令将赵昕的葬礼放在当年五月举行，且“厚为之礼”，并对孙沔等人的“缓葬期”的劝谏置若罔闻，完全沉浸于丧子的悲痛之中⁷。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条、夏四月壬申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4792～4793页。

2 涉及仁宗、英宗易代问题的论文主要有：江天健：《北宋英宗濮议之剖析》，《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八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年；张明华：《从曹皇后的道德自虐看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对宫廷女性的负面影响》，《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张吉寅：《水灾、狄青与宋仁宗朝立储之议》，《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六月甲午条，第2833页。

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三六，中华书局，1957年，第32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宝元二年六月壬申条，第2909页。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宝元二年八月甲戌条，第2922页。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庆历元年二月己亥条，第3103～3104页。

赵昕病逝六个月之后，庆历元年（1041）八月壬午，朱才人诞下皇第三子¹，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正月封皇第三子为“鄂王、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仍赐名曦”，然而，加封诏命尚未下达，赵曦便病逝²。在赵昕、赵曦病逝的前后两年，宋仁宗的六位皇子、公主相继夭亡。皇子、公主的频频早逝，当与宫中医官畏首畏尾、不敢及时对症下药的错误举动密切相关，蔡襄曾直言医官“临病互相推脱，不肯及时下药，以致病深，虽有良医，无由措手”³，如此看来，赵昕、赵曦的早夭实是人祸，而非天灾。

与景祐时期不同，皇第三子赵曦病逝后，仁宗未再将宗室之子养于宫中，而是想尽办法，欲使宫中后妃诞下皇子。据史料记载，嘉祐四年（1059），仁宗接受建议，加封柴氏后裔，以期庇护皇嗣诞生⁴。然而，无论仁宗想出何种办法，皇第三子薨逝之后，仁宗之后妃再未能诞下一位皇子。

从赵宗实入宫、离宫的过程可以看出，仁宗并不希望皇太子之位归于过继嗣子，故皇第二子赵昕未出生，赵宗实并被送出皇宫；当皇第二子、第三子相继离世后，仁宗想尽办法欲使后宫嫔妃再次诞育皇子，而未再选宗室才俊养于宫中，足见仁宗对过继他人之子为嗣的反感。仁宗的这一态度为仁宗朝迁延不决的储位问题埋下伏笔。

（二）多因一果——仁宗朝立储之议的兴起

由于宋仁宗不希望过继他人之子为嗣，而皇第三子赵曦病逝时，仁宗又正春秋鼎盛，故一时亦无人劝谏仁宗早正储位。直到皇祐五年（1053），太常博士张述呈上奏议，请仁宗立储，仁宗朝立储之议由此兴起。

仁宗朝立储之议之所以从皇祐五年开始兴起，当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皇宫惊变的教训。庆历八年（1048）冬十月壬午日，宫中卫士意图作乱，“踰屋至寝殿”，在仁宗居住的福宁殿下“斫宫人伤臂，声徹帝所”，此时若非曹皇后临危不乱，一面“遣宫人驰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卫”，一面“遣宦者持水踵贼”，并剪发为证，告知负责平叛的宦官们“贼平加赏”⁵，恐叛军将攻入福宁殿，仁宗亦有性命之忧。这次皇宫惊变虽然最终平定，但也警醒群臣，若这次皇宫惊变以叛军击杀仁宗收场，那么未立储君的北宋王朝恐有亡国之虞。

第二，仁宗身体每况愈下⁶。庆历八年皇宫惊变之后，仁宗的身体每况愈下，据《邵氏闻见录》记载，至和年间（1054～1056），仁宗一度“昏不知人者三日”⁷。嘉祐元年（1056）春正月甲寅日，仁宗在大庆殿接受朝拜时，“暴感风眩，冠冕欹侧”，此后在同月己未日接见契丹使者时“语言无次”，无法终礼，至庚申日更是神志不清，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如非宰相文彦博及时阻止，险些酿成重大冤案⁸。仁宗身体健康状况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三，庆历元年八月壬午条，第3161页。

2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三六，第32页。

3 [宋]蔡襄：《蔡襄集》卷十八《乞责罚医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31页。

4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191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五，庆历八年冬十月壬午条，第3970页。

6 据史冷歌先生考证，宋仁宗应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急性脑血管疾病，且病症日益严重，直至危及生命。史冷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河北大学出版社，第41、48页。

7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条、己未条、庚申条，第4394～4395页。

如此之差，随时可能崩逝，如崩逝之时尚无储君，北宋政局难免混乱。

第三，北宋有立储之成例。宋太祖早年不曾立储，导致其崩逝后亲生皇子不但未能登上皇位，且不得善终。因此，自宋太宗起，北宋便有预立太子的做法，宋太宗于至道元年（995）八月壬辰日，“制以开封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史学家李焘在评论此事时，称“自唐天祐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上始举而行之，中外胥悦”¹，足见时人对预立储君之事的赞许；宋真宗亦于天禧二年（1018）八月甲辰日，“立皇子昇王为皇太子”²。太宗、真宗两朝立储之后，皇位传承虽仍小有波折，但储君均得以登上皇位。因此，至仁宗一朝，朝臣普遍将立储看做是维护王朝安定的圣明祖制，维护这一圣明祖制，自然是朝臣的主要政治任务。

综合以上三点，宋仁宗朝的立储之议便于皇祐五年兴起，并逐渐演变成一场劝谏活动。

（三）古今相间，天人感应——群臣进谏方式初探

自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张述呈上《上仁宗乞遴选宗亲试以职务》这一奏疏始，百官朝臣掀起了劝谏仁宗立储的活动。南宋时赵汝愚所编修的《宋朝诸臣奏议》（以下简称《诸臣奏议》）一书中，共收集北宋时群臣请立太子奏疏三十二篇，其中涉及仁宗朝储位问题的奏疏便有二十七篇之多。而这远非朝臣的全部立储奏议，范镇曾称其“前后上章凡十九次”³，而《诸臣奏议》仅记载六次，韩宗彦等中下层朝臣的奏议亦不见《诸臣奏议》记载⁴。由此可见，劝谏仁宗立储已成为皇祐五年后北宋朝臣的重要政治任务。

朝臣在劝谏仁宗立储时，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式，企图使仁宗或主动或被动地同意立储：

第一，以前代兴亡为借鉴。前代之兴亡更替，可为后人之借鉴。北宋朝臣在劝谏仁宗立储时，常常回顾汉唐以来历史，以期引起仁宗注意。嘉祐元年欧阳修进谏时，举汉文帝、后唐明宗为例，并明言希望仁宗“洞鉴今古”，能够从宗室中选择贤良之人“依古礼文，且以为子”⁵；同年，知制诰吴奎进谏时亦以两汉之事为言，称“汉成之于哀平，孝和之于安帝，皆兄弟之子”，认为仁宗选择宗室贤良为嗣时，应仿照两汉成例“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系四海之心者也”⁶。此外，范镇等人进谏时，也常以前代之事为言，希望仁宗皇帝警醒。

第二，借祖宗“故事”相规劝。这一方式，皇祐五年张述上疏时便曾使用，张述在奏疏中称“艺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传真宗，真宗以传陛下。陛下承三圣之业，传之于千万年，斯为孝矣”⁷；嘉祐元年，范镇在上疏时，则更进一步，以真宗时“故事”劝仁宗再养宗室子于宫中，以备储位之选⁸。此外，司马光等人的奏疏中，亦常提及祖宗时立储之事，以劝仁宗立储。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八，至道元年八月壬辰条，第818页。

2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真宗纪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165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四，嘉祐元年十一月辛巳条，第4454页。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八，嘉祐三年闰十二月辛卯条，第4542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嘉祐元年秋七月丙戌条，第4425～4426页。

6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三十《上仁宗乞立太祖太祖之曾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294页。

7 《宋朝诸臣奏议》卷三十《上仁宗乞遴选宗亲试以职务》，第287、288页。

8 《宋朝诸臣奏议》卷三十《上仁宗乞参考祖宗故事以定大计》，第288、289页。

第三，借天象和灾祸以诤谏。嘉祐元年五月，天象生变，“二星相继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¹，不久京师开封及周边诸路便大雨不止，水灾频发，据史料记载，京师开封一度“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²。水灾尚未过去，天象再变，“彗出东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³。司马光、范镇等人借此机会再劝仁宗立储。司马光认为“当今甚大而急者，在于根本未建，众心危疑”，仁宗如能够明诏立储，“然后人人自安”⁴；范镇则认为正是因为不立储才导致“水不润下”⁵，故水灾泛滥；同时，天象变化在范镇看来，则是因为仁宗不准备立储，导致人心不安，“所以感动上天之变也”⁶。正如韦兵先生所言“行星异常变化的周期性发生，往往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引起轩然大波，朝野对此都非常关注，诸多政治事件、政治决策背后就是以人们对当时发生的异常天象的附会性理解为观念背景”⁷，借用天象和灾祸来劝谏仁宗立储，虽未能立即奏效，但应当对仁宗有所触动。

古今事例交替使用，天象、人事相互呼应，仁宗朝末期的朝臣竭尽全力推动仁宗皇帝速速立储，解决国家的根本大事。但立储之事，最终决策权还是掌握在仁宗手中，唯有仁宗同意立储，朝野才能真正实现安定。

（四）从否决到接受——宋仁宗立储思想转变的过程

自皇祐五年张述劝谏始，至嘉祐七年赵宗实被立为皇子终，仁宗朝末期的储位争端历时近十年时间。这近十年时间中，宋仁宗思想转变历经数个阶段，终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半自愿半无奈地同意过继宗室才俊赵宗实为皇子。

第一阶段（皇祐五年至嘉祐三年），不欲立储阶段。这一阶段，宋仁宗始终认为自己还会再有亲生子嗣，对朝臣所论及的过继宗室才俊为嗣的建议持否决态度。不过，宋仁宗绝非易怒、暴躁之君，对劝谏奏章多采取“不报”这种冷处理方式，对范镇这种十数次上章，言辞激烈求正储位的“顽固”臣子，也不过罢其言职，另任命为“起居舍人，充集贤殿修撰”之职⁸，仁宗打算以较为柔和的方法，逐步消磨掉朝臣的劝谏积极性。从其结果而言，自范镇解除言职后，劝谏立储的章疏确实大幅度减少，仁宗似乎取得了与朝臣较量的胜利。但是，由于力主立储的朝臣大多数没有离开中央，他们仍然可以找准时机再劝仁宗立储。

第二阶段（嘉祐三年至嘉祐六年），游移转向阶段。这一时期，已年届五旬的宋仁宗终于意识到自己几乎不可能再诞育皇子，对选择宗室才俊过继为嗣的建议开始有所接受。嘉祐三年（1058），包拯面陈立储之议时，仁宗已不再完全反对立储，答复包拯“徐当议之”⁹。见仁宗思想有所转变，嘉祐六年（1061）前后，朝臣的立储劝谏活动又一次兴起。嘉祐六年闰八月辛未日，司马光面谏仁宗立储时，宋仁宗表示谏官陈立储之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丑条，第4432页。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嘉祐元年六月戊寅条，第4415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丑条，第4432页。

4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十六《请建储贰或进用宗室第二状》，四川大学出版社，第506～508页，2010年。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嘉祐元年六月乙卯条，第4416页。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丑条，第4432页。

7 韦兵：《行星星占与宋代政治：以荧惑入犯、太白昼见经天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四，嘉祐元年十一月乙丑条，第4454页。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七，嘉祐三年六月庚戌条，第4513页。

事无害，“古今皆有之”，并同意司马光的建议，将自己的立储之意晓喻宰相¹；嘉祐中期，面对宰相韩琦等人劝谏时，仁宗又保证“宗子已有贤知可付者，卿等其勿忧”²。不过，仁宗此时仍对产下亲生皇子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除前述加封柴氏后裔一事，同样在嘉祐中期，韩琦劝谏速速立储时，仁宗还声称“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然而最终产下的均为皇女³。故可以说，仁宗在嘉祐三年至六年间，对立储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但已开始倾向朝臣们的立储建议。

第三阶段（嘉祐六年至嘉祐七年），决意立储阶段。仁宗面对朝臣的不断进谏和自身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无奈之下不得不决意立储，以防自己崩逝后国家内乱。嘉祐六年冬十月，宋仁宗在与宰执群体会商司马光、吕海所上劝谏立储的奏章时，表示自己早存选拔宗室才俊入继为嗣的打算，并直接点明赵宗实可为嗣子。次日，赵宗实并被起复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⁴。嘉祐七年，宋仁宗下诏，立赵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储位遂定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宋仁宗立储思想无论如何转变，作为父亲，仁宗对过继之子都不可能如亲生之子一般喜爱；作为帝王，仁宗对非亲生的青年皇子始终怀有极重的防备之心。故储位虽定，而仁宗之心未定，政治风波亦不会轻易平息。

二 坎坷历程——皇子、皇帝与太后垂帘

皇子赵曙，幼时曾养于宫中，八岁离宫回府后，有“天性笃孝，好读书，不为燕嬉褻慢，服御俭素如儒者”的美誉⁶，似乎是皇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宋仁宗始终对过继之子为嗣心存不甘，故对皇子赵曙难免冷落。仁宗的冷落，对皇子赵曙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一）谦避隐忍，饱受冷落——赵曙的皇子之路

由于赵曙幼年便曾被养于宫中，对北宋朝野的险恶环境应有所了解，故其在嘉祐六年接到起复任命后，并未立刻赴任，而是以服丧为由多次缴还敕告，一意谦避。然而，这种谦避并没有使赵曙避开来自皇宫内外的谗言和仁宗的反感。

嘉祐七年谏官王陶面谏仁宗时直言，赵曙之所以不敢接受起复任命，是因为“宫嫔、宦官有以上惑圣聪，而使宗实畏避不敢前”⁷；而《忠献韩魏王家传》更是指出当时局势对赵曙极端不利，“内则宫人、宦官之不悦，外则大臣、小臣之横议”，导致仁宗“不得不惑”⁸。除了朝野的妒忌与横议外，宋仁宗也因赵曙迟迟不肯接受

1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第10758、10759页。

2 《宋史》卷十三《英宗纪》，第253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五，嘉祐六年冬十月壬辰条，第4728页。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五，嘉祐六年闰八月丁未条，第4719页。

5 《宋史》卷十三《英宗纪》，第254页。

6 《宋史》卷十三《英宗纪》，第253页。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秋七月丁卯条，第4771页。

8 [宋]王岩叟：《忠献韩魏王家传》卷五，载《宋集珍本丛刊》第六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649页。

起复任命而对其心生不悦，在于宰相韩琦议及此事时，仁宗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¹，有收回起复诏命之意。若非韩琦极力劝阻，恐怕赵曙不但难以取得皇子之位，生命安危已将受到影响。

面对多方压力，赵曙只能愈发谦避，并忍耐来自各方的非议。仁宗于嘉祐七年八月乙卯日下诏立赵曙为皇子，直至十三天后的壬辰日，赵曙“犹坚卧称疾不入”²。下诏二十天后的己亥日，面对皇族长辈同判大宗正事赵从古和虢国公赵宗谔的敦劝，赵曙“犹固称疾”，这一日“使者往返数四，留禁门至四鼓”，但赵曙终不肯入宫³。直到下诏二十二天后的辛丑日，赵曙终于在亲信周孟阳的劝说下入宫。而周孟阳的劝说之所以奏效，实是周孟阳抓住赵曙意图自保这一弱点，称：

太尉事两官以父母，中外所闻，主上为万世计而立为子矣。今固辞不拜，假如得请归藩，遂得燕安无患乎⁴？

这一番话，终于使赵曙意识到此时已是骑虎难下，唯有接受皇子之位才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燕安无患”，故立刻“抚榻而起”，接受皇子之位，入宫朝见仁宗。

正位皇子后，嘉祐七年冬十月己亥日，“皇子上表辞所除官，赐诏不允”⁵，可见皇子赵曙仍保持谦避隐忍的处事原则，但这种处事原则并未能换得仁宗的关照与爱护。立赵曙为皇子之后，仁宗很少单独召见皇子，对其冷漠异常。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日，仁宗“幸龙图、天章阁，召辅臣、近侍、三司副使、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观祖宗御书”，而后“又幸宝文阁”，仁宗写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其后仁宗兴致未尽，在群玉殿大宴群臣，“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⁶。整个游阁赐宴的过程中，仁宗未赐皇子飞白书，更未与其吟诗唱和，足见仁宗对赵曙的冷淡与漠视。

谦避隐忍，饱受冷落，赵曙于皇宫中的处境实在难堪，如长此以往，赵曙的皇子之位恐终将不保。幸而赵曙正位皇子几个月之后，宋仁宗暴崩，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此时本正是宋英宗一扫心中阴霾，主理国家政事的绝佳机会，但即位仅数日，宋英宗竟突发重病，不能理事，北宋王朝才丧旧主，新主又病，王朝发展前景为之蒙尘。不过宋英宗重病起因，或并非史料记载那般简单，还应进行深入探研。

（二）再说病因——宋英宗疾病源起新考

据史料记载，宋英宗于嘉祐八年夏四月壬申日即位，四日之后的己亥日，便不豫⁷。且疾病来势迅猛，宋英宗一度“不知人，语言失序”。至己卯日，英宗病势愈发严重，在仁宗灵前“号呼狂走，不能成礼”⁸，甚至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八月丙子条，第4772页。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八月壬辰条，第4776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八月己亥条，第4776页。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八月辛丑条，第4777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冬十月己亥条，第4781页。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条，第4785页。
 7 《宋史》卷十三《英宗纪》，第254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夏四月己亥条、乙卯条，第4795页。

狂呼“待杀我”之语¹，几近癫狂。史冷歌先生曾详细分析宋英宗疾病的成因，认为英宗本就患有脑血管疾病，而即位前在宫中又坚持谦避隐忍之原则，内心煎熬痛苦，诱发了恐惧症。几重原因相加，导致英宗甫一即位，便被脑血管疾病和恐惧、焦虑等情绪击倒²。

史先生对宋英宗疾病源起的分析虽已十分详尽，但细致审阅史料，不难发现，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导致英宗“重病”：

第一，仁宗朝老臣盘踞二府，英宗难以独立施政，心情郁闷。英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多为久掌权柄的仁宗朝老臣³。尤其是时为昭文相的韩琦，曾在仁宗崩逝、国家无主的情况下，与曹皇后共商大政，拥立英宗，可谓有不世之功⁴。面对这样一批老臣，英宗一时难以独揽朝纲，处理朝政时只能“深执谦巽，端拱渊默，群臣奏事，一无可否”⁵，长此以往，心情难免郁闷，间接地加重了自身病情。

第二，主持仁宗葬礼实非英宗所愿，“重病”或可避开葬礼。前文已经提及，过继他人之子为嗣本就是无奈之举，故仁宗对英宗自然缺乏照顾；而英宗入嗣时已经年过三十，自八岁由皇宫返回王府之后，二十余年一直承欢于濮安懿王赵允让膝下，与濮安懿王父子情深，与仁宗则没有丝毫“父子”情分，因此，英宗当非常不愿主持仁宗葬礼，这时身染“重病”或可成为躲避葬礼的最佳方式。自“重病”后，英宗便很少参加仁宗葬礼，十一月，仁宗虞主至自山陵时，英宗未亲迎，而是由“皇太后迎奠于琼林苑”⁶；同月，“虞于集英殿”，英宗仍不肯亲临，导致“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犹用在途之礼”，祖无择、司马光等人劝谏英宗亲祭，英宗答应“翊日亲虞”，但终以“不豫”为借口，“卒令宗正卿摄事”⁷；同月甲辰日，英宗终于亲祭虞主，却不肯放声痛哭，幸亏吕夏卿攀附《仪礼》中的“卒哭”之礼，才得以为英宗转圜⁸。如上所述，英宗的所谓“重病”，绝非是简单的脑血管疾病和恐惧症。

宋英宗如此“重病”，既有身体因素，亦有心理因素，更有政治因素，但无论如何，即位数日的宋英宗已再难自主理朝政，北宋王朝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统摄全局的政治家站出来安抚朝野之不安，曹太后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垂帘听政的。

（三）余波未消——曹太后垂帘与两宫失和

宋英宗在仁宗灵前“号呼狂走，不能成礼”的当日，以韩琦为首的宰执群体立刻决意请仁宗皇后曹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主持朝政大局。《宋会要辑稿》详尽的记载了曹太后垂帘时期的政务决策流程：

1 《忠献韩魏王家传》卷五，第650页。

2 《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第42、45、72页。

3 据《宋史·宰辅表》和《宋宰辅编年录》卷之五记载，英宗即位时，中书门下长官为昭文相韩琦、集贤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槩；枢密院长官则为枢密使张昇、枢密副使胡宿、吴奎。英宗即位一个月后，富弼除丧，亦拜枢相。

4 《忠献韩魏王家传》卷五，第650页。

5 《司马光集》卷二十六《上殿札子第二道》，第626～627页。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祐八年十一月己亥条，第4830页。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祐八年十一月庚子条，第4830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祐八年十一月甲辰条，第4832页。

初议于内东门垂帘奏事，而帝方服药，权居柔仪殿东阁之西室，皇太后居其东室。辅臣日入东阁候问圣体，因奏事。至五月二十七日，帝初御延和殿，至六月三日，复不出，唯辅臣得入对柔仪，退诣内东门小殿帘外，覆奏事于皇太后。至七月十三日，帝始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辅臣每退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事如初¹。

由此可见，曹太后垂帘时，只是掌握“覆奏”之权，而未总揽朝政大权，宋英宗仍能够对朝政做出决断。且英宗幼年被养于宫中时，曹太后对其“抚鞠周尽”²，两人本应相处融洽，但出人意料的是，曹太后垂帘后不久，便与宋英宗的关系急剧恶化，这未免令人惊讶。综合分析史实，或可推断英宗与曹太后关系恶化之原因：

第一，宦官的谗言。宋英宗“遇宦官尤少恩”，导致“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³。曹太后久居深宫，身边最为信任之人只能是贴身宦官，面对宦官的谗言，曹太后难免对英宗心生不快。但是，曹太后也绝非偏听亲信宦官一面之词的庸碌女性，仁宗崩逝当晚，曾有宦官欲即刻打开宫门，召辅臣入宫，曹太后便及时制止称“此际宫门岂可夜开！且密谕辅臣黎明入禁中”⁴，从而确保朝野安定，使得北宋帝位得以顺利传承。由此可见，宦官谗言当不会使两宫关系彻底破裂。

第二，英宗病中待太后多有失礼之处。据《长编》记载，英宗患病之时“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曹太后亦曾向宰相韩琦哭诉英宗失礼之事，并欲废英宗而另立，幸为韩琦所阻⁵。但是，英宗病情之严重，曹太后应是亲眼得见，即便英宗因病有失礼数，曹太后为此心存芥蒂，一度有废立之念，但经大臣劝解亦不至与英宗之关系完全破裂。

第三，曹太后与前朝老臣的密切关系及其保守立场为英宗所反感。曹太后“性慈俭”又“颇涉经史”⁶，对赵宋的祖宗成制万般遵从，又在仁宗崩逝当晚临危不乱，力保英宗顺利即位，故其素得仁宗朝老臣韩琦、富弼等人的尊重。当宋英宗暴病难以处理朝政之时，韩琦等人立刻推曹太后临朝垂帘，足见曹太后与这些前朝老臣关系之密切。而英宗即位后便有摆脱前朝老臣控制之愿，对与前朝老臣关系紧密的曹太后不免反感。同时，曹太后对政治事务持保守立场，反对变革，这种保守立场到神宗熙丰变法之时，表现的尤为突出，曹太后曾公开称“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⁷，企图说服神宗贬斥王安石，破坏变法。这种保守立场，与“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⁸的宋英宗严重对立，双方关系的破裂自然在所难免。

第四，在英宗病体康复之后，曹太后竟然以“上病新愈，恐未可出”、“今素杖皆未具，更少须”⁹等理由拒绝撤帘还政，更加剧了宋英宗的不满。幸而以韩琦为首的宰辅及时做出应对，多次劝谏曹太后撤帘，至治

1 《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一一，第226页。

2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后妃传上》，第8621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六月癸巳条，第4815页。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夏四月辛未条，第4792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祐八年十一月甲寅条，第4838页。

6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后妃传上》，第8620、8621页。

7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后妃传上》，第8622页。

8 《宋史》卷十三《英宗纪》，第261页。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治平元年夏四月丁丑条，第4862页。

平元年（1064）五月庚申日，终使曹太后正式撤帘，宋英宗得以亲政，宋仁宗、英宗易代之事至此才正式结束。

三 影响深远——宋仁宗、英宗易代事与宋代政治

宋仁宗、英宗易代之事虽已结束，但其对宋代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尚需进行深入分析。易代之事，始于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张述上书劝立储，终于治平元年宋英宗亲政，共历时十一年。在这波橘云诡的十一年中，以储位、皇权为中心，政治事件、政治风波此起彼伏，不曾停歇。这些政治事件与政治风波对宋代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推动了“濮议之争”的展开。英宗亲政后不久，如何确定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名分，便成为摆在英宗和朝臣面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治平二年（1065）四月，英宗“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¹，自此诏命始，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濮议之争”就此展开。最终，以英宗及宰辅官员为首的“皇考派”取得胜利，濮安懿王被尊奉为皇考，而以司马光等台谏官员为首的“皇伯派”则相继被贬黜朝廷。经此一事，英宗不但“报复”了仁宗当年的冷落与漠视，并且扩张了帝王权威。可以说，正是仁宗、英宗易代之时所遗留的部分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濮议之争”的爆发。

其次，部分仁宗朝老臣逐步淡出政治舞台，英宗亲信进入二府任职，神宗朝变法的阻碍被部分移除。宋英宗亲政后，部分仁宗朝老臣选择淡出政治舞台。治平元年十二月，枢密副使吴奎“以父忧去位”²；治平二年七月，枢相富弼“以足疾卧家，累上章求罢”，最终“罢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同年，枢密使张昇“久病在告求罢”，七上辞章后罢为“章信军节度使、判许州”³；治平三年（1066），“数乞谢事”的枢密副使胡宿，“罢为观文殿学士，知杭州”⁴。大批老臣去职乞退的同时，一些为英宗所宠信的大臣进入二府任职，如被英宗称赞“善文章”、“清直好学”的王畴于治平元年被任为枢密使⁵；数为台谏弹劾却颇得英宗赏识的陈升之于治平二年被任命为枢密副使⁶。如此一来，素来厌恶变革、主张维持现状的部分老臣退出政坛，英宗亲信之臣得以身居高位，这些亲信之臣不反对甚至支持变革⁷，变革之风由此兴起，这股改革之风至宋神宗朝更是演变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变法运动。

再次，影响南宋皇位传承。宋仁宗、英宗易代事对南宋皇位传承亦产生影响。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之子赵昀病逝后，高宗后宫再未诞下一位皇子，故储位一直空悬，群臣亦多有立储劝谏。至绍兴年间，高宗终于决定立储，在立储之前，高宗确定立储原则，称：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条，第4957页。

2 [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六，治平元年十二月戊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348页。

3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六，治平二年五月癸亥条、七月癸亥条，第351～352页。

4 《宋史》卷三百一十八《胡宿传》，第10368页。

5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六，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条，第348页。

6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陈升之传》，第10237、10238页。

7 陈升之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据记载，陈升之在熙宁变法时，曾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宋史》卷三百一十二《陈升之传》，第10238页。

在天之灵。¹

由此可见，高宗欲效法仁宗，过继宗室之子为后（只因太宗一系在靖康之难中消亡殆尽，故高宗决意选择太祖一系）。绍兴二年（1132），太祖之后赵伯琮（入宫后赐名赵瑗）、赵伯玖（入宫后赐名赵璩）相继被养育于宫中。经数十年精心培育与选择，至绍兴三十年（1160），高宗又仿效仁宗、英宗易代之成例，将赵瑗“立为皇子，更名炜”。直至两年之后高宗决意禅让，才将赵炜“立为皇太子，改名昚”²（赵昚即宋孝宗）。不仅高宗、孝宗易代仿效仁宗、英宗易代之成例，其后宁宗、理宗易代，理宗、度宗易代亦仿效仁宗、英宗易代之成例。由此可见，仁宗、英宗易代事，至南宋已经成为祖宗“故事”，供后世效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台谏、宰执激烈论辩的“濮议”之争，还是波澜壮阔的王安石变法，亦或是南宋时期的皇位传承问题，均与宋仁宗、英宗易代事有密切关系，故宋仁宗、英宗易代事绝非简单的一朝易代，而是影响整个宋代政治发展演变的重要事件。

四 结 语

宋代自太祖、太宗易代时，便有“金匱之盟”、“斧声烛影”之疑案；至真宗、仁宗易代，女主垂帘干政、朝臣存心各异，政局一度极为混乱；至仁宗、英宗之易代，亦未能平稳顺利，仁宗之猜疑、宦官之间言、英宗之“暴病”，如非宰辅得力、太后临危垂帘，则北宋政局恐将混乱不堪。

但是，因仁宗、英宗易代之事而被正式确立的皇嗣养子制度，对宋代政治的发展、皇位继承制度的创新亦产生积极影响。南宋多位无子帝王仿效仁宗、英宗的易代“故事”，从宗子中选择俊才，以备皇储之选。保证了在皇嗣不兴的情况下，帝位能够顺利传承。为宋王朝稳固其统治，提供了较为有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¹ 《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第615页。

² 《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第616～617页。